

“分数偏见” 缘何越来越重

——从《家有儿女》到《小舍得》 看荧幕上家长众生相

文化娱乐现象述评

十几年前,在我国首部以家庭教育题材反映青少年成长的电视剧《家有儿女》中,我们看到了因为成绩好什么都对的小雪,也看到成绩不好被亲妈都嫌弃的刘星。十几年来,荧幕上的“刘星”日子越来越难,从聚焦中考的《小别离》,到专注于高考的《小欢喜》,再到这些天热播的把视角对准“小升初”的《小舍得》,甚至关注“幼升小”的《陪你一起长大》……孩子的快乐越来越少,家长的分数偏见越来越重。《小舍得》的导演张晓波说:“我们在思考,父母究竟是爱孩子,还是爱成绩好的孩子。”

和《家有儿女》有些相似,《小舍得》剧中的孩子也是十岁左右的年纪。两部剧也都是发生在一个重组家庭。《小舍得》中因为父母的再婚,让宋佳饰演的南俪和蒋欣饰演的田雨岚成了一对“半路姐妹”,她们一个主张快乐教育、因材施教,一个遵循精英教育、丛林法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剧集开篇,在父亲策划的团圆宴上,南俪和田雨岚首次登场就开始了“比拼”,田雨岚让“牛娃”儿

子背圆周率,南俪就让女儿唱歌展才艺……原本,“牛娃”可以奔着《家有儿女》中小雪的人设发展,结果被繁重的学习逼出了呐喊:“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

事实上,这种荧幕上家长的“分数偏见”从《家有儿女》开始就没有断过。记得当年《家有儿女》有个片段,刘星一次历史考试考得不错,结果全家人都认为他作弊,还要他赶紧承认,可刘星的确没有作弊,他那时是热衷玩一款历史类游戏,所以拓展了很多知识。因为成绩不好,加上有些调皮,刘星干什么、说什么,就连亲妈刘梅也是第一时间嘲笑或是贬低他。而作为学霸的小雪,总是说什么都对,有一集是刘星迷上了福尔摩斯,天天假装自己是侦探,要帮家里破案,但家里没一个人当回事;可小雪迷上了研究野生大猩猩,刘梅就投其所好,甚至将小雪的房间装扮成猩猩展室……十几年过去了,每当观众重温这部剧时,都会留言“心疼刘星!”

观众们一边“心疼”,一边又不知不觉地成了“爱满分”的妈妈。《陪你一起长大》编剧刘觅滢原本是个主张快乐教育的妈妈,为了写剧体验生活,和儿子一起去了趟小升初的暑托班,当儿子面对“牛娃”时,她感到了焦虑。和很多年轻家长一样,



刘觅滢在补习班里学到的第一课也是,深呼吸,告诉自己,亲生的,亲生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改变教育思路,“舍”童年快乐去“得”分数。

这么多年来,和教育有关的影视作品,其焦虑大都是源于爱满分的妈妈,其实不妨学学《成长的烦恼》里的老爸杰森,他的启发式教育方式,或许能让“爱满分”的妈妈学到很多。毫无疑问,金色的童年和冰冷的分数如何取舍,每个家长都懂,也都希望孩子做一个真诚善良的人,来日方长。若有一天,荧幕上的爸妈和孩子,不谈分数,只谈成长,那才是真的放下了焦虑!

本报记者 吴翔



■《小舍得》海报

呼唤文学回归戏剧舞台

阿来称话剧《尘埃落定》的精神气都在

4月8日起,改编自阿来同名小说的话剧《尘埃落定》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演出了5场。舞台上,一个生于权力之家的“傻子少爷”,见证了一群“聪明人”在土司制度末日余晖下的“血色浪漫史”。最后一幕,漫天尘埃徐徐“落定”,白茫茫的石头落下,太阳冉冉升起……近日,作家阿来、话剧《尘埃落定》编剧曹路生、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上海分社社长曹元勇以及文学戏剧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史诗质感、诗意呈现与戏剧冲突并存的可行性,呼唤文学回归戏剧舞台。

语言艺术的胜利

从小说藏语,直到上学第一年才开始汉语学习的阿来在两种语言间穿梭。阿来接受专访时告诉记者,藏语中的“傻子”语意与汉语中的傻子在语境不同时不一样,“如同‘妖精’这个词,在汉语中多为贬义,但在藏语中,完全就是魅力四射无法阻挡的意思。”

话剧《尘埃落定》由九维文化携手四川人艺打造,阿来看后给予“水乳交融,天衣无缝”的评价。他非常喜欢这部戏,不是因为它是《尘埃落定》,“而是因为我们有了艺术,就是靠这种艺术在形式上一举成功,跑在别人前面。我说它是‘水乳交融’,即改编者的语言和原著当中的那些语言,能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阿来看来,小说《尘埃落定》的成功,不是人物关系或者是题材的结果,而是“语言的胜利”。“精气神都在,这叫忠于原著。不管是剧本,最后的舞台呈现,《尘埃落定》的精气神都在。”

《尘埃落定》结尾时,傻子总结自己一生,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我既身处其中,同时又飘然抽离”。“我们全情投入在自己的生命里,可是我们没有时常抽离出来旁观过自己、评判过自己?我们随波逐流得多,抽离得少。《尘埃落定》是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个问题在话剧舞台上,得到了解决。”阿来说。“我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能不能再开放一些,如果停留在演什么像什么,我们还要艺术干什么?”

叙述方式的创新

18年前,编剧曹路生一口气读完了《尘埃落定》原著小说后,就沉湎于小说诗意的语言难以自拔,“甚至可以说是很震惊!”正是因为“舍不得放掉”阿来原著中诗意美好的语言,所以曹路生在改编时有意保留了主人公傻子的大量内心独白,并以此贯穿剧本。曹路生说:“其实里面通道不止两三个,四五个都有,可能是人家说话时他的潜台词,或者是他介入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中,或者是对上天说,或者是叙述,或者是描述历史,或者是评判,或者是哲理性……这是不同的叙述方式。我一直都很自信,只有这种方法可以表现阿来原小说的精髓和他的哲理和思想性。”尤其是当最后一幕中,死去的傻子还在诉说,但却被困住的叙述方式,“是一个新的叙述方式”。

曹元勇认为曹路生的改编让他看到了所有的诗意,所有的浪漫和所有的哲理,引发了无限的思考。

本报记者 徐翌晨



何多苓个展“草·色”本月开展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何多苓大型个展“草·色”将于4月25日起在龙美术馆(西岸馆)举办。此次展览汇集了何多苓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重要作品70余件(套)及各类文献,呈现艺术家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中的独特脉络和阶段性变化。草的意象贯穿他40余年的创作,提供出一条理解他绘制的丰饶色相的线索。

长期工作、生活在四川成都的何多苓是中国当代优秀油画家。在绘画语言上,他早期受怀斯等西方画家的影响,后在承接中国古典绘画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油画语言的绘画性,融汇中西绘画观念及技法,淬炼出纯熟精妙的绘画技艺,形成优雅而蕴有诗意、单纯但又隐含神秘的绘画语言。何多苓的抒情能力和

语言技巧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绘画艺术开启了新的维度。在此后观念迭出的当代艺术进程之中,他致力于完善个体的生命体验表达,不断地将音乐、诗歌、建筑及其他领域的认知融汇于自身的绘画。近年来他更多地借助自然和历史记忆的广角镜,诠释现实的变迁与时间的循环。



■在本展上展出的何多苓作品